

泛海书院丛书

# 亲历与见证

## —— 一个经济学家与改革开放40年

江春泽 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泛海书院丛书

# 亲历与见证

## —— 一个经济学家与改革开放40年

江春泽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亲历与见证：一个经济学者与改革开放 40 年/江春泽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 12

(泛海书院丛书)

ISBN 978-7-309-14059-0

I. ①亲... II. ①江... III. ①改革开放-中国-文集 IV. ①D6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66726 号

亲历与见证：一个经济学者与改革开放 40 年

江春泽 著

责任编辑/岑品杰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出版部电话：86-21-65642845

上海丽佳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27 字数 488 千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4059-0/D·969

定价：80.00 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序

放在我们面前的这本书,是亲身参与四十年来中国改革过程的江春泽教授对亲历历史事件的见证和追忆。由于中国改革所具有的重大历史意义和江春泽教授作为政府智库高级研究人员的身份,她的这些见证和追忆都能为中国改革的决策者和研究者提供宝贵的经验材料和思想启发。

江春泽教授自1977年初从北京大学被借调到中共中央宣统口后,就开始投入党政领导部门为改革制定方针政策和有关的理论研究工作。20世纪80年代以后,她在研究苏联经济的基础上深入观察了南斯拉夫的“自治经济制度”。接着,她被公派到美国访问研究。1986年回国后,继续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1988年调任国家体改委国外司副司长,负责国外经济体制的比较研究。1994年后调到国家计委经济研究中心(后称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做研究工作。2000年后仍然退而不休,继续勤奋工作,新著迭出。在长达数十年的研究生涯中,江春泽教授还为比较经济体制学科的创建做了大量工作。

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1990年9月和12月由她执笔写作的《计划与市场在世界范围内争论的历史背景与当代实践》和《比较·选择·前景》等两篇内部报告在90年代初期计划与市场大辩论中所起的作用。在当时,主流舆论转而强调“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计划经济”“改革要问‘姓社’‘姓资’”。在中共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和1987年十三大进行市场取向改革的决定受到

颠覆性威胁的形势下,江春泽教授用简明扼要的文字,把上下一百年全世界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争论的历史与实践概括地加以阐明,呼吁继续推进市场取向改革,为 1992 年中共十四大确立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起到了鸣锣开道的的作用。

如果说江春泽教授 1990 年的那两篇报告涉及的主要是政策层面上的问题,她在 2014 年出版的新著《猜想与求证——社会主义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世纪探索》就在更加本质的层面上探讨了有关计划—市场选择的理论问题。

这部著作作为前述两篇报告的进一步深化,超越前述报告之处在于不是就事论事地比较改革的不同具体做法,而是深入探讨体制选择的核心问题,即哪一种体制更能实现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它从新古典经济学大师帕累托(V. Pareto)关于计划配置与市场配置同样有效的假说(江著把它称为“帕累托猜想”)切入,总结了 20 世纪针对这一假说进行的理论探讨和实践检验。这样,就把经济体制比较提高到更加本质的层面上,也为否定从帕累托假说直接引申出来的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即科尔奈(J. Kornai)所说的“直接行政控制”(IA)体制的可行性作出了有理有据的论证。

然而,对于集中计划体制的批判性分析并没有为正确选择改革目标模式扫除所有的障碍。回顾社会主义各国改革的历史,对帕累托假说进行了某些实用性修改的市场社会主义,较之从帕累托假说直接引申出来的集中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而言,对于正确选择经济体制和改革目标模式的消极影响更为巨大。“市场社会主义”的要点是在继续保持对国民经济的行政管控和国有经济的统治地位的条件下,有限度地引入市场机制,形成科尔奈所说的“间接行政控制”(IB)体制。所以,市场社会主义的要建立的“市场”并不是由自由自主交易所形成的真正的市场,而是政府通过直接的和间接的计划进行控制的“规制下的市场”(regulated market)。到头来也未能取得成功的苏联改革、匈牙利改革、南斯拉夫改革,都属于这种类型的改革。在中国,则表现为诸如“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国家掌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等“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体制。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以来,中国的市场取向改革取得了巨大进步。1992 年中共十四大确定建立的,不是市场社会主义式的行政管控下的市场,而是真正的市场。但是,市场社会主义的思想和实践还会以不同方式妨碍具有统

一开放、竞争有序特性的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帕累托猜想”的求证过程并未结束。为了在新的历史时期全面深化改革,我们仍需继续努力。

吴敬琏

2018年4月20日

# 引言

## 当代中国历史发生了什么样的转折？

40年前的中国，经历了伟大的历史转折。那就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此开启了改革开放、寻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新时期。

历史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转折呢？

在此之前，1949年，我们已经经历了一次从旧中国到新中国的开天辟地的巨变。此后的十多年里，中国人民热情奔放、斗志昂扬地建设新中国，那是激情燃烧的岁月，各条战线朝气蓬勃的广大人民群众，辛勤劳动，艰苦卓绝地奋斗，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辉煌成就。但由于极左指导思想的屡屡干扰，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已经伤害了一些无辜的人，甚至因冤假错案使一些知识精英和革命干部受到不应有的伤害。在经济建设中，又由于违背客观规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广大人民群众的热情、干劲和相当多的智力与体力劳动被浪费了。

### 1. 苦涩的“文革”动乱

更有甚者，到了20世纪60—70年代，所谓“文化大革命”的那场十年浩劫的历史是苦涩的，“阶级斗争”更是发展到疯狂的地步。众多开国元勋受到迫害，几乎各省区市、各条战线的领导干部都被打倒，成了“叛徒”“特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蹲在“牛棚”里，仅中央和国家机关副部级以上高级干部、地方副

省级以上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就高达这类干部总数的75%;大批知识分子横遭凌辱,几乎所有为新中国建设做出突出成绩和有杰出贡献的英雄模范、有成就的学者、知名作家、著名演员等都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或“黑苗子”“黑帮”“黑五类”等“黑线人物”;知识分子普遍被视为是“资产阶级”的,排行在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的第九位,号称“臭老九”。被“四人帮”煽动起来的不明真相的群众暴虐无法无天,随意抄家、批斗,什么“坐飞机”、戴高帽、挂自我侮辱的大牌子、剃“阴阳头”、低头弯腰、下跪等等,损害人的尊严,危害人的健康直至生命,弄得鸡犬不宁,人人自危;而且在长达十年群众斗群众的“革命”运动过程中,随着上层权斗的演变,每每因上面被打倒一个,下面又株连一大批,有些人从“红得发紫”又变成“阶下囚”。他们又牵连一大片的人挨整。在普通群众中,有些无辜者也可能因一言一行不慎,或者因亲属家人的牵连,顿时就成了“坏人”“敌人”。各省区市、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的广大群众,都因观点不同而被分割成五花八门的派别群众组织。派别群众组织之间的派性斗争已经上升到动枪动炮的武斗。如此等等,非正常死亡者难计其数,受株连者数以亿计。

与此同时,“四人帮”还摆出一副“理论权威”的姿态,搞理论专制主义和理论霸权作风。他们提出一些荒谬绝伦的口号,如:“按劳分配是资产阶级的权利”;抓生产就是“唯生产力论”而要遭到批判;鼓吹“读书无用论”,表彰交白卷者为“英雄”;甚至明目张胆地叫嚷“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等,为了闹“革命”,全社会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大学停办、中小學生离校,工人不在车间,师生不在图书馆和课堂。如此等等,国民经济怎能不被折腾到崩溃的边缘?一个好端端的国家被糟蹋成如此这般的图景:物资匮乏、供应短缺、人民物质生活普遍贫穷、文化生活普遍单调。由于闭关锁国,广大的中国人民对外部世界更是一无所知。

## 2. 曾经被颠倒的历史是怎么被颠倒过来的

但是,人民渐渐地看到一线曙光,那就是邓小平受命于危难之时,加入到周恩来总理所进行的遏制、纠正极左错误的工作中,开始了大刀阔斧的全面整顿。有良知的人们怎能忘记历史大转折关头发生前夕的那些刻骨铭心的日日夜夜?

人们屏住呼吸，耳闻目睹从四面八方大道小道传来的种种信号。在作者的资料堆里存放着一份手抄的大事记，可以帮助我们回忆起在那个动荡的岁月里发生的惊心动魄的事情。看！在“文革”动乱开始6年之后，毛主席高度评价和重用邓小平：

1972年1月10日 毛主席在出席陈毅追悼会时对陈毅夫人张茜说：“邓小平是人民内部矛盾”。

1972年8月14日 毛主席在邓小平8月4日信上批示：一，中央苏区时挨整的，是毛派头子（邓、毛、谢、古）；二，无历史问题；三，协刘伯承打仗得力、有战功。此外，进城后也不是一件好事没做，如率团赴莫斯科。

周恩来总理接毛主席批示后，立即通知中共江西省委：宣布解除邓小平体力劳动，恢复党组织生活。

1973年3月10日 周恩来总理主持政治局会，传达毛主席批示，讨论邓小平的工作安排问题，得到政治局同意。

4月10日 经毛主席、周总理提议，中央作出恢复邓小平国务院副总理的决定。

4月12日 邓小平以副总理身份出席宴请西哈努克的宴会，第一次公开露面。

8月 邓小平在中共十大被推选为主席团成员，并重新当选中央委员。

12月15日 毛主席在书房对大军区负责人和政治局委员指着邓小平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他呢，有些人怕他，但他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也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毛主席对邓小平说：“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

1974年3月 政治局根据毛主席指示，决定由邓小平为团长，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江青反对，毛主席给江青写信：“邓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意见。”

10月 毛主席向政治局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表示对邓信任

支持。

10月20日 毛主席让王海容、唐闻生转告周总理与王洪文：“总理还是总理，建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12月23日 周总理与王洪文到长沙向毛主席请示人大和政府的人事安排，毛主席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毛主席又一次重申：邓作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

1975年1月5日 在毛主席的坚决支持下，中共中央发布1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

1月10日 闭幕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

1月18日 闭幕的全国四届人大第一次会上，邓小平被选为第一副总理。

### 3. 邓小平受命于危难之时，实施挽救全局的全面整顿

1974年6月1日 周总理病情恶化，住进医院，邓小平接替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和党中央日常工作，站在了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这时，国家已经到了无法正常运转和前进一步的危急时刻。必须进行全面、彻底的整顿，才能扶大厦于将倾。他根据毛主席提出的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正确意见，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整顿的口号，在各条战线开始了坚决果断、雷厉风行的整顿，着手解决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如：

6—7月 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他指出了军队存在肿、散、骄、奢、惰5个重要问题。整顿军队打击了“四人帮”乱军的阴谋，保持了军队的稳定，为其他战线整顿的顺利进行提供了保障。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命脉，邓小平从抓铁路运输开始整顿国民经济。在铁道部万里的支持下，迅速扭转混乱。

1975年5月 召开钢铁工业座谈会，使钢铁生产情况很快有了好转。

在铁路、钢铁生产好转的带动下，其他行业情况也有了转机。

在整顿中，邓小平特别强调科技和教育的重要性。他指出，科技是生产力，要发挥知识分子作用，要后继有人，就要重视和发展教育。

1975年 派胡耀邦去整顿科学院，当年8月胡耀邦提出了《关于科技工作

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

邓小平还及时提出整顿党风，反对派性。

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邓小平说：“当前，各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问题。农业要整顿，工业要整顿，文艺政策要调整，调整其实也是整顿”，“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还提出学习毛泽东著作要系统地掌握其精神实质，不能简单化、庸俗化、割裂毛泽东思想。

整顿很快收到明显成效，使“文革”造成的政治混乱、经济崩溃的中国重又出现了生机。

1975年9月20日 周恩来总理作癌症手术。在入手术室前，他用颤抖的手握住邓小平的手，大声说：“小平同志，你这一年多来的工作证明，你比我强得多！”

但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再次打倒邓小平的运动，正在密谋策划之中。此前，1975年3月，张春桥掀起批“经验主义”恶浪，喊出不能让“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口号，要实行全面专政。江青借批“经验主义”，把矛头指向邓小平和刚恢复工作的老同志。毛主席发现后，刹住歪风。沉默3个月后，7—9月谣言四起，“四人帮”又借毛主席评《水浒》掀恶浪，席卷全国。

9月17日 江青在大寨说：“评《水浒》要联系实际。评《水浒》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毛主席呀！我看是有的。”目的是要打倒邓小平和一大批领导干部，以便他们篡党夺权。这股恶浪掀起，使邓小平的整顿工作陷入困难境地。

9月 毛远新进中南海，成了毛主席与政治局的联络员。

11月2日 毛远新对毛主席说：“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上去了。”“外面担心中央，怕出反复。”毛远新的话，就是向主席说明邓小平的整顿就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这对于将“文革”作为自己一生所做的两件事情之一的毛泽东，无疑产生极大刺激。前不久，康生向他告状说“邓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联系起来，使他相信毛远新的话，引起他对邓小平的不满。按毛主席的意见，政治局开几次会对邓小平的错误开展批评。

邓小平在原则问题上不让步,被停止了部分工作,毛主席让他“专管外事”。

1975年8月13日、10月13日 毛主席借故多次批评邓小平的整顿是不要阶级斗争。他说:“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邓小平是“历来不抓这个纲的”,“还是‘白猫’‘黑猫’啊!”还说邓小平“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但他表示“邓小平的问题还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批还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这时,邓小平已很难开展工作了。

1976年2月25日 华国锋代表党中央讲话:“当前,就是要搞好批邓,批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对邓的问题,可以点名批判”。由此,“批邓”运动展开。“四人帮”把邓主持起草的三个文件(总纲、科学院汇报、加快工业发展)作为三株大毒草,污蔑整顿就是“复辟”。是“右倾翻案”,是“推行修正主义纲领”,并大批“唯生产力论”,持续9个月的整顿工作夭折了。全国再度陷入政治大批判的混乱之中。但广大群众对“批邓”反应冷淡,甚至反感,多次“转弯子教育”也无济于事。

#### 4. 敲响“四人帮”的丧钟

周总理从1972年5月18日被诊断为癌症后,先后做6次大手术,8次小手术。1975年12月底无法进食。

1976年1月7日 晚11时,周恩来总理对吴阶平医师说:“我这里,没什么事情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吧!”这是他最后的一句话。

1976年1月8日 上午9:57,周恩来总理的心脏停止跳动。下午3时,毛主席的护士向毛主席念了讣告内容,毛听着听着闭眼,泪珠流到脸颊、嘴角、脖颈、衣领,始终没说一句话。

1976年1月9日 清晨,人们从广播中听到了周总理逝世消息,全国笼罩着悲哀气氛。

但江青却说:“周死了,我也要和他斗争到底”。王洪文说:“化悲痛为力量,首先要批邓”。“四人帮”反对邓小平致悼词,叶剑英坚决主张由邓小平致悼词。

1976年1月11日下午,周恩来总理遗体送八宝山,出现十里长街百万人哭送场面。“四人帮”百般限制和压制人民群众对周总理的悼念活动。江青叫嚷“不能用死人压活人”,加紧煽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激起人们极大的愤恨。

1976年3月5日《文汇报》砍掉了周恩来学习雷锋的题词。25日又刊文影射周总理是另一个“最大走资派”。这些终于引发了长期积压在人们心头的怒火。

1976年3月28日南京群众在雨花台、梅园悼念周总理。街头和火车车厢出现“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到谁”“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打到张春桥”等矛头直指“四人帮”的标语。

1976年3月19日从这一天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出现第一个花圈后,花圈、悼念诗词一天比一天多,其中有的花圈重达500公斤。

1976年4月2日游行队伍从四面八方一支接着一支进入天安门广场,到下午已有20多万人。

1976年4月4日广场集聚了200多万人,深情悼念周总理,指名道姓声讨“四人帮”的活动达到了高潮。当晚,“四人帮”洗劫了广场上的全部花圈、诗词和标语,抓走了57个护花圈的工人,并规定5日起不准群众进入广场。

1976年4月5日清晨,愤怒的群众高呼“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并烧毁了民兵指挥部的小灰楼。晚9:20,万名警察民兵包围广场,武力镇压。

1976年4月7日政治局决议:任命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撤销邓小平一切职务。随后,开始了全国范围的对“反革命”的大审查。

天安门的抗议运动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广泛深厚的群众基础。伟大的“四五”运动表明,人民已经觉醒,万众敲响了“四人帮”的丧钟。

## 5. 解决“四人帮”问题,是毛主席生前的夙愿

“四人帮”做尽坏事,激起广大群众极大愤慨,成为众矢之的。他们乘毛主席逝世之机,网罗死党,制造舆论,拼凑非法武装,企图武力夺权,使党和国家命运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

“四人帮”在“左”倾思潮的基础上,利用个人崇拜和全国大动乱的特定历史条件,兴风作浪作恶长达十年之久,是产生在党的肌体上的毒瘤。“四人帮”是“左”倾发展到极端而产生的恶果。它成为时刻危及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定时炸弹。

1974年7月17日 毛泽东第一次在政治局会上,指着他们四个人说:“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在四届人大筹备期间,毛主席针对江青的组阁阴谋,对到长沙告状的王洪文说:“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不要搞上海帮。”还在江青提出的组阁名单的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人贵有自知之明。”

1974年12月23日 王洪文第二次到长沙,毛泽东对王洪文说:“江青有野心,有没有,我看有。”“你们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是要摔跤的。”“我几次劝你,不要几个人搞在一起,你总是不听,这一次,你既然来了,就多住几天,好好想一想,写个书面检查给我。”毛主席的洞察力挫败了“四人帮”组阁的阴谋,使“四人帮”地位急转直下。

1975年5月3日 毛主席在政治局会上,对“四人帮”更严厉的警告:“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同200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此后不久,毛主席明确提出要解决“四人帮”问题。毛主席说:“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解决“四人帮”问题,铲除党的肌体上的毒瘤,是毛泽东生前的一个夙愿。

## 6. “四人帮”急于抢班夺权

江青布置她的写作组搞了一个材料,说明刘邦死后,吕后如何把各诸侯一个个搞掉。

她还窜到小靳庄、新华印刷厂,声称她代表毛泽东,说:“女人也能当皇帝,到了共产主义也有女皇”。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1976年9月5日 毛主席病情恶化,已进入弥留之际,江青却窜到新华印

刷厂,四处请工人吃文冠果。她对工人们说:“文冠果就是文官夺权”。

1976年9月9日 毛主席逝世。

1976年9月16日 两报一刊社论,发“按既定方针办”的毛主席临终遗嘱(伪造的)。事实是,4月30日,华国锋陪毛主席接见外宾,华国锋向毛主席汇报一项工作时,毛主席指示“按过去方针办”,写在一张纸上,还写了“你办事,我放心”的纸条。“四人帮”已迫不及待地要动手了,抛出“遗嘱”为其篡权制造合法依据。挽救党和国家的危亡,已刻不容缓。

1976年10月6日 下午1时,中央办公厅发出当晚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通知。通知说10月6日晚8:00开会。当晚,叶剑英、华国锋(有警卫)坐在怀仁堂正方,汪东兴站在屏风后面,注视着门口。晚8时,张春桥第一个进入,几个战士架其到正厅,华国锋向其宣读中央决定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4人进行隔离审查。华国锋读毕,张春桥被戴上手铐,从后门押走。接着是王洪文。姚文元来后,没让他入正厅而是让人领他到东廊的休息室,由警卫团的一位副团长向他宣读决定,姚未争辩,也未反抗,说声“走吧”,即随卫士出了门。同一时间,由另外的行动小组对住在中南海的毛远新和住在钓鱼台的江青采取了同样的行动,未遇反抗。

耿飚、迟浩田顺利接管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社。

当晚10时,在玉泉山9号楼,召开了政治局会议,通过叶剑英的建议:由华国锋担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主席。

## 7. “两个凡是”与“真理标准大讨论”之较量

1977年1月8日 缅怀周总理的人民群众再次涌向天安门,大字报、诗词、花圈又一次布满天安门广场,强烈呼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

1977年2月7日 两报一刊发表社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篇社论把华国锋“抓纲治国”的指导思想——“两个凡是”颁于天下。“两个凡是”使伟业中兴的中国徘徊难进了,使人们思想再陷囹圄。

1977年3月 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围绕“两个凡是”和“邓小平问题”

展开激烈争论。会议刚开始,华国锋向各组召集人打招呼:两个最敏感问题(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出来工作)发言不要涉及,他在会上的长篇讲话重申了“两个凡是”。陈云、王震首先坦陈己见。华国锋无力反驳,只好用行政手段压住不让他们的发言见诸简报。

1977年4月10日 邓小平以一个共产党员身份给华国锋、叶剑英和党中央写信,指出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

1977年5月24日 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说:“一个人讲的每一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说过‘凡是’。”邓小平是全党、全国人民走出“两个凡是”禁区、开辟思想解放道路的先导。“两个凡是”的真正突破,是邓小平在第三次被打倒一年零三个月之后的复出。

1977年7月 中共中央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被恢复了“天安门事件”前的所有职务。他一生三次被打倒,三次复出,而且一次比一次更加引人注目,一次比一次取得更大成功。

## 8. 一场席卷全国的当代思想解放运动

对毛主席顶礼膜拜使中国人民不容置疑地把毛主席的话当作最高标准。“两个凡是”则把这条标准推向绝对的至高无上的地步。

南京大学哲学教师胡福明的文章是1977年9月寄给《光明日报》理论部王强华的。总编辑杨西光看大样时发现题目很好,认为可以抽出来放第一版做评论文。但杨西光认为文章写得太学术了,需要大改。本书作者江春泽(当时正在中央宣传口调研组工作)告诉杨西光(原来在复旦大学任党委书记时是本书作者的老领导),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也在写同一主题的文章,建议杨西光请示胡耀邦并与中央党校研究室主任吴江商量,可否把两篇合一篇。后来听说,经两位作者(胡福明与孙长江)和两个编辑部(中央党校《理论动态》与《光明日报》理论部)多次反复修改,最后经胡耀邦审阅定稿。于1978年5月10日先刊登在中央党校内刊《理论动态》上。

1978年5月11日 《光明日报》以头版地位推出了这篇酝酿9个月之久反复修改的文章。胡福明的文章原标题是《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公

公开发表的特约评论员文章的标题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产生了强大的震撼力。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新华社发了通稿。一场席卷全国的当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就起源于此。

1978年5月13日 有人到胡耀邦家中,严肃地说:此文起了很坏的作用,把党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分歧公开暴露在报纸上,不利于党内团结。有人转告胡耀邦:华国锋说理论问题要慎重。

1978年5月17日 汪东兴说:《实践》一文,“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政治上是砍旗的”。

1978年6月15日 汪东兴召集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负责人开会,公然点名批评了胡耀邦。面对高压,胡耀邦又组织了第二篇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吴江执笔,送军报。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态度极为鲜明,他对“两个凡是”深恶痛绝。他亲自动手两次修改文章。胡耀邦就文章和罗瑞卿通了6次电话,交换意见。

1978年6月24日 该文在军报发表,与第一篇文章是姊妹篇。文章从理论上反驳了“凡是派”关于前文的种种责难和疑问,把争论公开化了。为此文发表倾注心血的罗瑞卿,于7月5日飞往德国治病。临行前,他给《人民日报》负责人打电话,留下了令人潜然泪下的话:“这篇文章如果要挨打,我愿先挨50大板”。谁料想到,距文章发表仅40天,他突发心肌梗死,离开了人世。

1978年7月 汪东兴到山东提出:“一不要砍旗,二不要丢刀子,三不要来180度大转弯”。华国锋指示中央宣传部对这场讨论“不表态”“不介入”。直到10月间,汪东兴还对《红旗》杂志负责人说:《红旗》要一花独放,“就是不表态”,“不要怕孤立”。

1978年7—9月 胡耀邦又组织了第三篇文章:《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检验》。此文1978年9月10日刊载于中央党校《理论动态》,9月26日又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从而把真理标准大讨论进一步引向深入。

1978年7月21日 邓小平同中宣部长张平化谈话说:“你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局面向后拉”。

1978年8月19日 邓小平在接见文化部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时说:“文